

唐铎回忆录选载 (上)

编者按：唐铎同志，湖南益阳人，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，一九二〇年到法国勤工俭学，一九二三年赴广州学习军事航空技术。一九二五年十月被派往苏联空军院校深造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，荣获列宁勋章、红旗勋章等多枚奖章。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三年四月回到祖国，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任职十一年，为培养空军部队和航空工业的骨干人才作出重大贡献，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。一九六四年调任辽宁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。“文革”中蒙受冤屈，被监禁七年。一九七八年平反恢复工作，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、副校长，并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。因患脑溢血，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沈阳逝世。

初到上海

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，发展到一九二〇年底，已有一千六、七百人参加。这么多人在法国找工作十分困难，何况又连续遭到中法政府的联合压迫，因而处境十分险恶，这就迫使我们大家为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发生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，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。

当初，吴稚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，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，筹建了里昂中法大学。但当校舍修缮完毕时，他却从国内招收了一批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，而拒绝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学。针对这种情况，赵世炎、蔡和森、李维汉、陈毅等同学，在巴黎组织了“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”，决定由各地勤工俭学学生中抽调一批人

组成“先发队”，前去里昂中法大学，通过说理斗争，进占该校。但是，中国驻法公使馆竟勾结法国当局出动军警，强行把我们一百零四名代表囚禁起来，并以“过激分子”、“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”等罪名，遣送回国。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，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登岸，回到了祖国。

这已是隆冬时节，寒气逼人，朔风刺骨，在岸上虽有工商学界的好心人士接待，使我们分别住进了荣升、新中和等旅馆，但我们的行李衣物已流散在法国各地，经济毫无来源，学习、工作又无去向，处于衣食无着、走投无路的境地。我们组织了“被迫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”，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斗争。记得我们住在荣升旅馆中的廖元璜、黄进一、傅昌巨、李坚伯、陈毅等同学，推举了陈毅等为代表，举行记者招待会，或到报馆、或拜访社会名流、或发出通电，揭露了中法政

府迫害我们的罪行，要求各界人士主持公理，募集捐款，联系进学校学习，等等。终于在经过一段活动之后得到了上海工商学界开明人士的同情，帮助我们解决了临时生活费用问题，并找到了复旦大学、中国公学、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接纳我们继续学习。中国公学允许免费，所以，我和廖元瑛，在一九二二年春，便进入了中国公学的商科去学习。

中国公学设在上海吴淞，由私人开办，校长是张东荪。张在上海还办有“共学社”，并主编上海的《时事新报》。我入学不久，就听他讲演，说是他也主张社会主义，但是却认为中国现时尚且不能实行，只宜研究原理，进行试验，然后再慢慢地以蚕食式的缓进办法逐步实行。我记得他在《时事新报》上写的文章中，表明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，但却建议可以选择一块地方进行试验。这位张校长，最喜欢学生们读他的报纸和听他那一套说教。我当时虽然辨别不清他的反动用意何在，却亦明显地感觉到，这同我在法国时学到的共产主义理论，是根本不相同的。

大约过了三、四个月，我们就想离开这所中国公学，转学到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去。一打听，它要收学费，这把我们难住了。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湖南同乡聂云台、谭延闿等人，他们有钱有势，何不借他们一臂之力呢？我们商定去找谭延闿试一试。那时，他在上海杨树浦提篮桥附近，有一所两层楼房的公馆。

我们到谭延闿公馆那天，正巧遇上他在院里踱着方步。只见他中等个子，肥胖的身上穿着缎子马褂和长衫，长方形的大脸上戴着一副眼镜。我们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，着重讲了我们想继续求学，为家乡父老争光耀祖的愿望，请他给以经济援助。

当时，他对我们态度很好，首先讲了一篇诗云子曰之类的话。他以古之仁人君子自

恃，表示愿意给我们以力所能及的资助。他是清末的翰林，平时好讲点学问装璜门面，也企图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，培植个人的势力。加之我们出国时，毛泽东、蔡和森等曾找过他协助解决赴法路费等款项问题。所以，他知道我们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些情况。他答应一个学期可以分两次给我们支付款项，负担我们的学费和宿膳费用。随后，他到房子里拿出来一张支票，交给了我们。

于是，我们高兴地同他告别，马上跑到银行取出钱来，就进入了中法通惠工商学校。

我同廖元瑛在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学习了半年之后，在一九二三年初春，临到开学前夕，我们又去找谭延闿时，他却已到广州去了。这时，弄不到钱，我们不仅无法入学，就连维持生活也成了问题。

我想来想去，决定直奔广州。

因为，当时的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大本营，在人们心目中是革命和进步之所在，是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。凡是革命的人、进步的人，都愿意往广州跑。我在跟随蔡和森等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过程中，虽然学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知识，相信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，但是还不懂得在中国应该怎样进行革命。我只是有个要革命的强烈愿望，而要革命，就要到广州去，这是我当时的基本想法。同时，也因为谭延闿已去广州，我当时还以为他是个先进人物，一定会继续接济我们这些穷学生。

我当时身无分文，又只身漂泊在上海，但是主意已定，就是徒步行走，沿路乞讨，也要奔向广州。

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，恰在这时，我再次遇到了胡意诚。胡意诚是长沙周南女校毕业生，新民学会会员。一九二〇年五月，我在上海等待出国赴法勤工俭学时，

经肖子暉介绍与她相识的。我与肖子暉到了法国之后，知道蔡和森曾写信叫她到法国去参加勤工俭学。蔡和森在信中写道：“我们希望阿姊、良姊以及黎泽芬、刘警余、胡意诚诸位”均能来法国（《新民学会资料》第313页）。但是她未去法国，而是到南洋新加坡华侨女中任教去了。她在上海和到新加坡之后，都曾在生活上对我加以指点，或寄钱、或写信，就象对待亲弟弟那样诚恳地关怀我，给了我以很大帮助和鼓励。这时，她回国到上海来办事，顺便到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来看望我。当她了解到我去广州的决心和困难境遇后，马上给了我一笔路费，并亲自到码头给我送行，嘱咐我好自为之，力图沿正路上进。

胡意诚大姐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到苏联去学习，不幸病故了。她在我走向革命的征途上，特别是在我举目无亲的艰难时刻，给了我以无私的援助、关怀和鼓励，我永远难以忘怀。

广州印象

一九二三年春天，我来到广州时，看到在大街上，不仅有袒胸露臂、忙碌劳动的男人，还有许多疲惫不堪的妇女同男人们一样，挑着扁担或是拉着双轮平板车，载着沉重的货物，往返于货栈和堤岸之间。有的妇女甚至还背着孩子。广州的男人都不留辫子，大多数妇女也不缠足。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。广州远在太平天国时代，人们就以剪掉发辫表示对清朝的反叛了。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来，这里的民主气息日益增长，因而人们就比较进步和开化了。

我到广州之后，因为没有钱住旅馆，便投宿一位同乡家中。这位同乡是我老家——湖南省益阳县岳家桥——一位邻居的女儿。她嫁给了永丰舰（后改称中山舰）上的一位军官。那位军官能说善讲，饶有兴趣地向我

介绍了许多广州的情况。他还很善意地关照说：“你要知道，在孙先生周围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真诚的拥护者、追随者；一种是企图升官发财别有用心的人。所以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上当。”

经过他一番介绍，我对广州的形势和孙中山先生的活动，有了初步的了解。同时，也使我感到兴奋愉快，并庆幸自己来广州的行动，是做对了。

宋庆龄试飞第一架国产飞机

到广州不久，我找到了谭延闿，向他说明了来意。他允诺我可以到湘军中去当一名军官，但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想要学习飞行，当一名空军驾驶员。谭延闿知道后，也不勉强我，便写了一封信，要我去找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先生。当时，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，就设在广州东郊的大沙头。我很快找到杨仙逸局长的办公室，呈上谭延闿的信，说明了我的来意。杨先生亲自接待，非常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经历。他耐心地听完之后，高兴地鼓励我说：“你从上海奔来广州，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，是有志气的中国青年。我非常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。”他还对我说：“现时在航空局属下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（实际上是个修理所），要学习飞行，可以先到这个厂里当实习生。不久，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，那时你再入学校去学习飞行。”我表示决心说：“志在飞行。从当学徒开始，也干！”他听了，高兴地拍着我的肩头，爽朗地笑了。这样，一九二三年春，我进入飞机制造厂当实习生，学习飞机发动机的维修技术和制造原理。这是我从事航空事业的开端。

我在飞机制造厂，听到许多关于杨先生的动人事迹。他是孙中山的同乡，青年时代就读于美国夏威夷大学，热心于航空救国，在一次国际飞行考试中获得了万国水陆飞机

执照。学成归来，就在孙中山支持下创建革命空军，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飞机队。为了表示追慕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志向，杨先生把孙逸仙（即孙中山）的名字倒过来，作为自己的名字，才叫做杨仙逸。他曾率领数十名青年，到美国纽约航空专科学校学习飞行。还向华侨募捐筹款购置了十二架飞机带回了广州。因而，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和朋友们的赞赏。

我还亲眼看到了杨先生在大沙头与其他飞行人员合作，用从国外购买回来的设备和部件，自行装配了第一架国产飞机。那架飞机装配好之后，在大沙头飞机场试飞，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亲自参加了试飞仪式。我们飞机制造厂的全体职工都停止工作，激动地参观了试飞。

我记得，那架飞机上只有两个座位，除了飞行员之外，还可以乘坐一人。试飞时，孙先生大声问道：“在场的诸君，谁愿登机试飞？”可是全场肃静，无人应召。孙先生环视众人一圈，微笑着，等待着。突然，站在他身旁的宋庆龄女士出人意外地向前走了几步，面对着孙先生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孙先生凝视宋女士片刻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飞行员黄光锐走上前去，给她戴上飞行帽和眼镜，她便端庄地走上飞机，坐在座舱中，在众目注视之下，乘飞机起飞了。

那架飞机飞上广州的晴空，在兰天上盘旋了几圈，做了飞行表演，不久，即安全降落了。大家拥上前去，就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那样，热烈鼓掌欢迎和庆祝飞行员和宋女士试飞成功。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敬佩之情，大家提议用她在美国读书时的英文名字“乐士文”命名那架飞机。孙先生高兴地表示同意，这就是“乐士文”号飞机的由来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，杨先生奉孙先生之命，随师东征，讨伐陈炯明。当东征军到达

博罗县梅湖白沙滩时，因一颗水雷爆炸，他和另四名革命者，不幸遇难殉国。广东省革命政府为他立了碑，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了“杨仙逸先生墓”几个大字，以表彰其为革命事业所建树的不朽功业和崇高的革命爱国精神。

杨先生殉难之后，接替他的也是一位华侨，即陈友仁。陈是广东顺德人，四十多岁了，但不会讲中国话，只能说英语。他的英文名字叫“叶夫根尼·陈”。他与华侨有很广泛的联系，极为同情孙中山的革命事业。但他本来并不懂航空，他当了航空局长时，曾有一位苏联顾问协助他处理航空事宜。顾问名叫李糜，是联共（布）党员，犹太人，会讲流利的英、德、俄三种语言。他们二位也非常关心革命的航空事业。我曾多次看到他们来飞机制造厂视察。

这个飞机制造厂，名目很大，实际上是个维修所。厂内只有杨先生通过朋友从美国买回来的十几架水上飞机，其中有几架教练机，有一架可乘五、六个人，还有一架可乘十几个人。这些飞机停落在大沙头附近的水面上或机场里，曾引来许多人士的参观和赞叹，都为革命能有这些飞机而感到宽慰和自豪。

制造厂约有一百多人，其中有两名美国工程师，几位德国和俄国的技术人员，还有十几名朝鲜人。厂子的规模虽然不算大，却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单位。这说明国际朋友们对中国革命的热情赞助和支持，也说明孙中山先生确实具有网罗国际人才为我所用的宽广胸怀。

我记得，美国的两名工程师具有很突出的实干精神。他们在教我们学飞机发动原理、修理维护飞机的技术，并且亲自动手操作时，总是特别热心。在工厂所有的飞机中，有两架是美国杰尔底斯工厂出产的，每架是四十五马力，时速为九十公里。这在当时就

算是世界先进水平了。所以，两位美国工程师很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另外的十几名朝鲜人，大都是青年学徒工。他们特别肯干，非常能吃苦。其中，朴泰下和金震经常和我一起干活，逐渐熟悉了，建立了真挚的友谊，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。

到飞机制造厂以后，广州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，使我的思想和视野大为开阔。我特别感到兴奋的，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下旬国民党“一大”期间，我们制造厂的职工，曾两次列队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游行，并亲耳听到孙中山先生热情洋溢的演说。我从会议主持人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中，知道了国共已经合作的消息，以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。因而使我受到了极大鼓舞，甚至觉得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，似乎是马上就要成功了。

在第二次参加庆祝国民党“一大”召开的群众大会之后，当我们唱着“打倒列强、除军阀”的革命歌曲，回到大沙头飞机制造厂时，却被惊呆了。工厂那栋最大的厂房和旁边搭起的一个大棚子，被陈炯明派来的特务侦探放火烧毁了。

厂领导从大沙头附近的水族人家那儿，租来了几只大船，作了我们的临时宿舍，生活了半年的时间，直到我们在大沙头之尾、邻近东湖西侧，找到了一所旧房子改建的宿舍，才离开那些水族人家的船只。

在船上居住时，曾为纪念列宁逝世举行过一次隆重的追悼会。当时的纪念活动，追述了列宁在人类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，表达了人们对列宁的崇敬心情。这对我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，从而更加坚定了我关于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。

一九二四年的三四月间，在飞机制造厂内，曾有过广泛发展国民党员的活动。有一天，厂里的领导人给了我一张加入国民党

的志愿书。他说，我们在广州革命政府属下工作的人员，都要加入国民党，为孙总理的三民主义，精诚团结，共同努力。我当即填写了这张表格，加入了国民党。

加入国民党之后，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斗争，就是镇压商团叛乱。一九二四年夏天，广州商团以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为头子，组织武装队伍，准备推翻孙中山大元帅府，另立商人政府。商团居然从国外购买了大批军火运进广州，还同佛山地主勾结，散布传单，策动罢市，说是广州马上就要“共产”了。他们实际上是在煽动反对国共合作的反革命情绪。他们的势力越闹越大，竟然还选了个军阀李福林当所谓“市长”。听说他们把捕去的革命人士割下头来，碎尸数段，丢进水里，或沿街示众。恰在这时孙中山已离开广州去韶关指挥北伐进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飞机制造厂的人非常焦急，很怕商团武装冲到大沙头来，抢夺或毁坏飞机。大家便自动组织起来，分班日夜轮流站岗防备商团袭击。过了十多天，孙中山先生指挥革命军队向商团武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。经过半天激战，就把商团军全部粉碎。这次镇压商团叛乱，主要是黄浦学生军的力量。我们飞机制造厂的人也参加戒严，搜查坏人，保卫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。

在镇压商团叛乱之后，我就离开飞机制造厂，被派到航空局军事飞机学校学习飞行去了。

(未完待续)

